

石鼓文鉴赏



尹博灵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石鼓文鉴赏



石鼓文鑒賞

作者 尹博靈 責任編輯 劉小地

出版發行：江蘇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二六五號，郵政編碼：111000九)

經銷：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中央路一四五號，郵政編碼：111000九)

開本二十四 印張七·三三一 插頁二 字數五四五〇〇

一九九二年七月第二版 一九九二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〇〇〇册

ISBN 7—5343—1602—2

Z · 37 定價：11.70圓

江蘇教育版圖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蘇)新登字第〇〇三三號

出版者的話

石鼓文是中國石刻文字之祖，歷來爲考古學界、文字學界及書法界所重視。爲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普及石鼓文知識，并冀望爲學術界最終破譯石鼓文之謎做一點推波助瀾的工作，我社投入必要的人力和資金，編輯出版了《石鼓文鑒賞》一書。

本書作者對石鼓的發現、遷徙、刻石年代，石鼓文的編次、體裁、特點、傳本，在漢字發展史和書法史上的地位，以及歷代對石鼓和石鼓文的有關研究，作了較爲系統的介紹。在此基礎上，作者依據家藏較早的石鼓文傳本（六百六十五字本），臨摹其文，考釋其字，今譯其詩，并邀請知名畫家師國棟先生根據譯詩爲本書繪製十幅《石鼓詩意圖》，這在我國尚屬首次。

本書係石鼓文鑒賞的普及讀物，亦可供考古學、文字學、文學、書法、美術愛好者及有關專業研究者參考。如果本書的出版能够對石鼓文的研究稍稍起到促進作用，我們將不勝欣慰。

江蘇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六月

石鼓文

于識古有大帮助。

周谷城題

全國人大常委員副委員長
周 谷 城
題 詞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郁律
蛟蛇走，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
千載誰與友。厭亂人方鬼，賢
文武未遠，猶忠厚。細思物理生
嘆息，人生安得如泣壽。時
蘇軾 石鼓歌句

辛未江樹峰書

中華詩詞學會研究部副主任
江樹峰 教授 題詞

序一

在世界的文字之林中，中國的漢字確實是異乎尋常的。漢字在亞細亞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延續使用幾千年，維係了一個統一的泱泱大國的存在，滋潤了五千年古老的文明。它是悟性的高強度結晶，既深契于宇宙、自然，又最簡明、直觀。它的創造契機顯示出中國人與世不同的文明傳統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它以高度的邏輯性，通古今、達四方的超時空性，超方言的適應性等特點，構成了無比恢宏的漢字文化。

縱覽漢字文化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們不難發現，殷商甲骨文已具備了文字學中的嚴密規律，為今天的方塊漢字奠定了基礎。而商周青銅銘刻，則已展示出漢字發展史和書法藝術史中的輝煌成果。東周初期石刻文字的出現，使得作爲炎黃思想文化載體的漢字廣爲流傳，為中國文字的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被稱爲『石刻之祖』的石鼓文，就是產生于東周初期的中國刻石文字的最古遺物。

石鼓文上承甲骨、金文之精髓，下開小篆、隸、楷之先規。不但堪稱漢字發展史的匯聚承啓點，亦是深入了解宏富浩繁之漢字文化的理想突破點。石鼓文自唐初發現，引起了

無數學者高度重視，探研歌贊者代不乏人。可惜原石存世既久，殘缺過半。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所載『天壤瑰寶』之北宋拓石鼓文先鋒本，亦只有四至全字，無法完整而準確地再現石鼓文之全貌。

今天，在石鼓文的故鄉——陝西，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尹博靈以家傳石鼓文初拓摹本和部分珍貴原拓為據，經多年悉心研究，寫出《石鼓文鑒賞》。此書收錄可稱石鼓文全文的六十五字，集考證、釋注，今譯、書法、欣賞為一體，全面系統地介紹了石鼓文概況及深層內涵，首次完成了石鼓文的白話詩譯，石鼓文字表，石鼓文與甲骨文、金文、秦篆書的對照，石鼓文復原刻石等高難度課題，將考古研究同藝術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展示出石鼓文在中國書法史與漢字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博靈同志五十三年研究石鼓文之始，深入研習中國傳統文化，寒來暑往，難行能行。他在深入探討中體悟到：如通過博大精深的漢字文化，喚起人們對代表東方文明的中華文化精華之珍視，則定能有益于社會和人生。

願他于此精進不懈，取得新成果。

胡厚宣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

序二

一九八九年孟夏，漢中尹博靈君由友人紹介，過余敝廬，出所臨寫唐拓石鼓文摹本來視余。自言學書有年，臨摹家藏，沉迷日深，探索研討，匯爲稿本。不敢厚自寶秘，甚願呈獻同好。以我服役于出版界，屬爲推薦，并爲之序。

噫！我于古刻全然門外，聞言驚詫，愧不敢當。心念此一疊寫本，果係臨自唐拓石鼓文摹本，無異爲唐初石鼓被發現〔一〕以來之又一次發現，爲宋拓『先鋒』、『中權』、『後勁』三本外添一可供學術界書法界研究之新資料。從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着眼，固當效綿力。學術爲天下之公器，亦極嚴肅端重之公事。是故首應酌情爲之敦請專家予以鑒定。

第念筆迹之存者，關中石鼓最古，世稱千古篆法之祖。

李嗣真《書後品贊》云：『史籀埋滅，陳倉藉甚。』唐初大書家虞世南、諸遂良、歐陽詢等，共稱古妙〔二〕；復經杜甫、韋應物、韓愈等歌咏，由此著聞于世。其質地爲花崗岩，其形則似一高裝饅頭，并非如鼓。石刻文字不及青銅鑄件抗磨穩定，壽命久長，因其暴露原野，風雨侵蝕，人爲破壞，以致石皮頽落，原迹廢毀。杜甫因有『陳倉石鼓久已訛』〔三〕之句，韋應物謂『風雨缺訛苔蘚澀』〔四〕，韓愈注意到『雨淋日炙野火

『燎』^{〔吾〕}的損壞。唐代確有拓本流傳，韋蘇州說過『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黑白分』，只以原石損壞，捶拓效果不好，『忽開滿卷不可識』^{〔吾〕}。韓昌黎十分重視石鼓的歷史價值，建議太學祭酒予以保護。他是看了拓本的，《石鼓歌》第一句便說：『張生手持石鼓文。』然而，『辭嚴義密讀難曉』，『年深豈免有缺畫』^{〔吾〕}。拓本爲紙質，更經不起天灾人禍，幾番風雨，鼠噬蟲蝕。石鼓幸能在唐初出現，其厄運不下于生民。

北宋梅聖俞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床，亡鼓作臼剗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臼易臼庸何傷。』當日就有雷氏子好古，『日模月仿志暮強，聚完辨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緣錦裝』^{〔八〕}。存字係舉其成數而言。歐陽修云，所見拓本『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九〕}。郭沫若就《中權本》所存字數，分全字、重文、半字、合文、贊文以計算之，『全字之數四百六十五，與歐陽所舉數目相同。然如并重文合文而言，則遠在其上。』^{〔十〕}

有關石鼓文及其研究，隋以前未見著錄。左丘明、司馬遷似未之見。唐初其名尚不甚著。唐宋諸家對其時代之考訂，主宗周說者居多，亦有以爲宇文周者；惟南宋鄭樵首據秦器推斷爲秦篆。前二說要皆考據未精，率爾臆斷，後人譏爲『幼

稚可笑』。我國近代考古學前驅馬衡，于二十年代撰《石鼓爲秦刻石考》，『特爲正其名曰「秦刻石」。』末段強調其名稱亟宜辨正：『唐以來著錄此刻者，蘇勗、竇臮皆以爲「獵碣」；其餘皆以石鼓名之，此尤大謬。當刻碑未興以前，只有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凡言頌德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立石又謂之「碣」。』『此十石之形制，皆與之同。其制上小而下大，頂圓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圓者；刻辭即環刻于其四面。此正刻石之制，非石鼓也；蘇、竇「獵碣」之名，差爲近之』〔二〕。睥睨于考古論壇之郭沫若，一九六三年序馬衡文集稱：『中國古代文物，不僅多因他而得到闡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護。』蓋以馬衡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職，于抗日戰爭時期，維護轉運保存秦刻石鼓十具及故宮珍貴文物于西南地區，勞績卓著，『凡德業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三〕今仍名石鼓者，蓋從俗耳。

然石鼓之研討存在問題尚多。立石之年代，十石之次第，原文之考釋與復原，拓本、寫本、撰述之審理，均以尚缺信而有徵之文獻根據，石碣剥泐又難辨認，于今徘徊三時原上，縱情暢想，恐亦難得其解。其不可臆定者，嚴謹之學者付之闕疑，不敢苟同。以此石鼓文之聚訟久矣。其贗雜陳，好事者穿鑿附會，學者間糾紛不已。韓退之已慨然嘆曰：『嗟予

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泪雙滂沱！』〔三〕比韓文公晚生七百餘年的楊慎，本是好學窮理之人，慘遭朱明政府下放雲南邊鄙之地，好務博欲勝人的脾氣不改。余嘗游其新都故園，鄉人謂慎于書無不覽，獵奇披異，記憶驚人。投荒之日，老而彌篤。記誦之博，論古之豐，居明代之首，然亦難免時有疏失。所撰《石鼓文音釋》三卷，自序稱其前輩詩人李東陽得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將爲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馮維訥《詩紀》亦據以載入古逸詩中。當時蓋頗有信之者，後陸深作《金台紀聞》，始疑其以補綴爲奇。至朱彝尊《日下舊聞考》，證古本以揭示楊慎強增字句，『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其釋『大』字『尤爲欺人明證』。且『蘇軾《石鼓歌》自注稱，可辨者僅「維鰣貫柳」數句，則稱全本出于軾者妄。』『即真出東陽之家，亦不足據，况東陽亦僞托歟！』〔四〕對明嘉靖間錫山安桂坡十鼓齋藏本，郭沫若嘗云：『此間（指日本學術界——引者按）學人因有疑安氏一本爲唐拓者，今案此說不確，事由《作原》一石可以判定。』〔五〕可見唐拓之爲學術界欽慕想望也。對郭氏石鼓文年代之考定，馬叙倫亦不以爲然，特著《石鼓爲秦文公時物考》及《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逾萬言，舉正郭說之遺失，彼此間討論熱烈。勇于以今

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交戰之鼎堂，堅持其秦襄公時物之論見外，亦言『馬說雖與余異，然足以補正余說之處甚多』^(二)。前輩論學風儀，誠爲學術研究領域中可喜可敬之典範。

尹博靈君以其所據、所臨、考辨、論說及白話譯解就商于余，尤以石鼓文唐貞觀拓本一事，余不能知，勉以訪師求友，勵志問學，再圖精進之方。余以爲按情理思之，應不厭其繁難。石鼓叙事史詩，爲吾中華民族文明進化過程中之重要一環，爲人類文明寶庫中之稀世瑰寶。尹君爲余講述其創獲時，余立憶及郭沫若《詛楚文考釋》中呵責同時代之專家某君謂：『讀書不細心，不能有所發明，竟連別人的發明也不能瞭解，實在是件可悲的事！』^(三)我引以鞭策自身，并建議尹君恭敬求教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處學者專家，爲之介紹訪謁國家文物局之專家及當今學界之大老。余嚮以爲君子愛人以德，誨人不倦。學者獎掖後進，即所以自大其身，所謂薪盡火傳，學業道術不知其盡也。十數年來，學術界氣象有所開朗，老輩多瞭然指示後學以津筏之重大意義，新秀亦知敬老尊師與受業傳道之關連。余勉尹君毋庸拘束踟躕，應有立雪精神。縱遇個別高明或名高者，仍習慣于自我封閉，口是而腹非，亦不足怪，細心聆聽其片言隻語仍可有所啓悟也。

歷史文物之鑒定，爲極其嚴肅的學術工作，非徒口舌之爭。真實無偽之物證爲第一性的，它如師承、學衡、名位乃至政治，都屬第二性或第二性以下之名目而已。據云所臨唐拓摹本不幸毀于丙午大火，亟宜根據已知線索，于天壤間窮源追本，盡人事以待機遇。《史記·封禪書》亟言九鼎之神秘，『秦往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郭沫若論斷『石鼓是襄公作西時時的紀念碑』。向傳師于北宋皇祐間搜得《作原》一石後，曾以石補復之。郭氏論及其事云：『此代替之石及傳師所補半石，意必尚存于人間。即《作原》原石之上半爲北宋土人所削去者，其零屑碎片亦必猶有殘存。如再于鳳翔附近從事搜索，其被削去之文字或將有重現之一日也。』〔二〕善哉，大手筆之暢想曲也。博靈之所臨，果爲唐拓之物證，幸能大顯于世耶？尹君聞言沉思，余拭目以待之。

謹嚴從事與嚴酷蕭瑟截然不同。學問之道，宜莊重和順，即《詩·召南》所謂『曷不肅雍？』《書·洪範》謂『恭作肅』；《禮記·樂記》云：『夫肅肅，敬也。』應爲對方設想而恭敬之。王國維乃一代宗師，論學則避咄咄逼人，所著《宋代金文著錄表序》中綜論諸書云：『國朝乾嘉以後，古文之學復興，輒鄙薄宋人之書以爲不屑道。竊謂《考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用力頗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

苟有所知，無不畢紀，後世著錄家當奉爲準則。至于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譏者，然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九〕《莊子·天下》嘗言：『君子不爲苛察。』海寧所言，有氣度，識大體，詢爲學術評論之準則。彼攀引師門，以煩瑣苛刻爲明察之輩，輕薄而不曉爲學甘苦者，余恐其三讀而仍無愧汗下也。

春去秋來，籬菊三放，博靈蕭然青鞚，復抱稿本來見。云幸承京華長者多人指點，審閱批改，大加增益；又蒙周谷城、趙樸初、啓功諸大老題署賞識。尤可欣喜者，歸後憶及摹本旁有小注一行，記陝西耀州有清刻唐拓本石鼓文碑。乃親至耀縣藥王山『小碑林』尋訪，竟于豢養大狼狗院中，覓得順治十六年據唐拓製成之石鼓文碑刻，可與曩昔摹本相印證，足解歷年臨摹吟哦之勞。

余未能身登華原，掃塵剔垢，摩挲審視，惟展硃拓觀賞而已，既引以爲慰，且殊以爲憾。與此同時，玄武湖畔好音傳來，欣聞蘇省決予版行，以扶持後進，興化右文。值此拜金之風勁吹之際，此舉誠令人感荷。是故余不能已于言，請以二事爲出版者與讀書界陳明之。

此稿爲學術研究提供探討駁難之資料。譚瀏陽嘗言：『哀

中國之亡于靜。』『言學術則曰「寧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率成『一無刺無非之鄉願天下』〔二〕。嗣同誠慨乎言之，故重視對待之理，即今人所謂樹對立面也，以期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昌明學術與治術。余料尹君此稿面世，必可引起駁議，諸如唐拓摹本之流傳，華原刻碑之依據，左重耀《刻石鼓文銘》與楊用修『僞本』是否爲旁系血親，白話譯解妥貼與否等情，將有宏論公表。

余以爲朱竹垞亦解人也，設如得見華原碑刻，將賞玩默想，當如何反思其對用修之嚴厲責難也耶？近年學者之辨僞者，于『僞書』行間每善窺知其一二真價，引以爲研討之助，而不欲一律格殺勿論矣！猶記一九八五年五月，中華書局出版鄧散木編著《石鼓斟釋》，係其親筆臨寫，據安桂坡十鼓齋本校補得四百七十三文，合重文三十九，合文四，共得五百一十六文。注釋博采衆說，參以己意，正其僞舛。十石次第，依宋紹興時王厚之說，與郭鼎堂等殊。鄧氏爲篆刻名家，校釋、摹寫甚見功力。其不可臆定者付之闕疑，不欲苟同。彼書雖薄而有份量，惜乎未聞好古者評述之。知音如不賞，石沉大海矣！來自石鼓故土之尹君，或將有大幸運，若有呵而問之者，即其難得之福也。

于此又憶及王靜安論文字考釋之難云：『自周初迄今，

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脉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强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二二』學術堂奧之探測，不能不允許迷失。聞尹君幼承家訓，少而好學，言動與浮薄奔競之徒有別。余切盼其稿爲識者說三道四，前指後戳，甚至大張撻伐，推翻而粉碎之，即零落成泥，亦可供稍稍改良現時古典學術研究、弘揚傳統文化之壤土也。

此稿亦爲法書研究提供欣賞臨摹之資料。石鼓文書體介于古文與秦篆之間，世稱大篆，爲研究我國大篆以及由大篆演進爲小篆之重要資料。我國使用篆書，由商至秦，約有一千五百餘年之歷史。由春秋起，文字形體漸有改變。下及戰國，『諸侯力征，不統于王』，『言語異聲，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二二』制定出小篆，用火與劍來貫徹『書同文字』。追本溯源，大篆在我國文字演進發展過程中居重要地位，而石鼓文爲大篆之典範，世以爲史籀之遺迹。唐竇臮《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